

■新作聚焦

李佩甫长篇小说《河洛图》:

家族传奇中的家国情怀

□白 烨

近读李佩甫新近创作的长篇小说《河洛图》,感觉内蕴上丰沛厚实,艺术上精雕细刻,称得上是近年来长篇小说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作品还向人们表明,以农耕文明、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原沃土,实为文学创作不可多得的富矿;而如李佩甫这样的“50后”一代作家,因生活积累十分厚实、艺术储备格外扎实,在小说创作上仍然宝刀不老,大有可为。

长篇小说《河洛图》是李佩甫在10年前撰写的《河洛康家》的电视剧本基础上,历经多年打磨而成的。剧本有巩义康家的原型,小说有《河洛康家》的依托,按说在此基础上完成小说创作并不困难,但作者却为此花费了很长时间,耗费了很多精力。有一篇见于报端的访谈,其中谈到李佩甫全力投入作品而不顾其他时说:“这证明他对于打造个人精神世界的专注与忘我。”这句话,我深以为然。在如今这个喧嚣的时代,静下心来去埋头创作,构筑自己的一方世界,是需要特别的能耐、特殊的定力的。正是由于潜心创作、不问东西,李佩甫才能再度写出《河洛图》这样具有历史纵深感、又具有精神丰厚度的小说力作。

《河洛图》主要描写河洛康家依托儒家文脉发家致富的故事。中原河洛镇有周家和康家两个远近闻名的家族。周家靠着柿饼熬霜糖扬名河洛,而康家则由不断变卖家产供儿孙读书,终于供出了两个进士,这使康家虽然生计拮据,却自有一种基于“字墨”的傲气。但周家的女子周亭兰嫁给康家的小子康咏凡后,康咏凡替为周捐躯又蒙受冤屈的父亲康国栋拼死苦谏,最终撞死朝堂。连失子嗣的康家老太爷康秀才把管家大权交给孙媳周亭兰,自己离家别居。临危受命的周亭兰一方面苦心支撑着家业,一方面精心抚养着儿子康咏文。长大成人的康咏文秉持“愚直”的康家为人传统,坚持以“仁”“信”的理念经商理财,使康家的产业从中原向西伸展到陕西,向东伸延到山东,不断发展壮大,遂又成为官衙压榨、兵匪祸害的对象,遭遇了更大的风险,经历了更多的坎坷。

这样一个看似并不繁复的故事,实际上已孕育了十分丰盈的内蕴。它看似是在为河洛康家的经商致富树碑立传,其实是以此为主线,囊括了不同层次的意涵:中原豫商的兴起与盛衰,中原文明在明清之

际由重农向重商的转型,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家族中的代际传承,民间的经商文化与官僚的封建政治之间的深刻矛盾,等等。还有一些说法,虽然颇显高蹈,也值得斟酌,如《河洛图》一书的腰封中说的:“展现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运命倾轧下的商业韬略,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这些说法可能都有理有据,但我以为,解读一部作品,要义不在于求高求全,而在于简约和准确。在我看来,《河洛图》有两个方面的要点特别突出,而有了这样两个要点,这部作品的价值与意义就自不待言。

其一,在对家族后人的悉心教育中传承传统文化精义。河洛康家有着深厚的“字墨”传统,尤其重视对于后人的启蒙与教育。周亭兰恳求康秀才好好教育康家子孙,康秀才以独辟蹊径的方式,教育康咏文和康有恒如何修身做人,把“整齐门内,提撕子孙”的优良传统表现得无以复加。康秀才给康咏文开馆授课,并不教他识文断字,而是以“上街去买字”的方式,让康咏文在实际生活中去碰撞、摸索和领悟,然后再结合这些实际体验讲述“仁义礼智信”的道理,使康咏文真切地懂得“人无信不立”的深刻道理。开蒙起始就以“仁”为基,以“信”为本,这使康咏文为人处事都格外仁义。于是,就有“三千两银子”救仓卒,冒死告发“盗卖仓粮”案的壮举,使康氏家族重新开祠堂,康家从此走上河运经商的康庄大道。

其二,在与各种势力的不断较量中匡扶社会正义。康家在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使他们发家致富的道路并不顺遂。但正是通过这种对抗与较量,康家显示出了中原豫商恪守的传统道德与儒家文化的正向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声张人间正气,匡扶社会正义的积极作用。

对康家构成威胁与障碍的势力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有以断指乔为首的花家寨劫掠官道商旅的杆子(土匪),有以捉拿“前明余党”为名肆意抓捕嫌疑人士的官衙捕快,还有以“剿匪”为名驻扎下来“设卡抽厘”的官家军队,更有紧盯着康家寻隙除祸的河务侍郎宋海平等贪官污吏。这些不同方面的势力交织一起,不仅对康家正常经商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且还以沉渣一气的为非作歹和狼贪鼠窃,给河洛一代的社会氛围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沉重阴霾。以康

梅文、周亭兰为核心的康氏家族,除以舍弃钱财财息灾祸,求访官员疏通关系来渡过难关外,还以救护人犯、帮衬义士、团结民众、揭露贪官等方式扶正祛邪,软硬并举地与邪恶势力展开有力抗争,并以暗中处死宋海平为标志,消除大患、为民除害,取得了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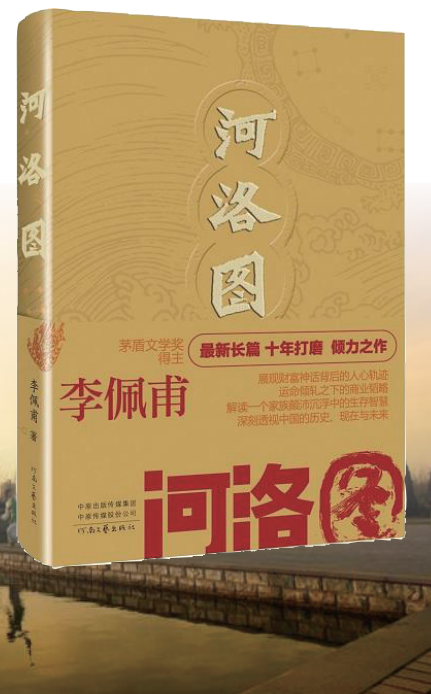
从向后人教授传统文化之精义到维护一方社会之正义,康氏家族的种种作为都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系连,那就是崇德向善、敬恭桑梓、守正不阿、恤民效国的家国情怀。康氏家族的“字墨”之风,康秀才的文化传授,康家后人的文化认同,其实都是根植于士大夫的文化信仰和中国先哲的人文精神,其核心要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康氏的经商理财与为人处事都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贯注了这样一种精神。或者说,豫商康家所以讲究“字墨”,崇尚儒家,正是在以他们的方式体现着建立在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基础上的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康氏家族走向致富的最大秘诀所在,也是中原文化的根本内核所在。康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也解说着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豫商康家所以讲究“字墨”,崇尚儒家,正是在以他们的方式体现着建立在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基础上的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康氏家族走向致富的最大秘诀所在,也是中原文化的根本内核所在。康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也解说着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康梅文都始终保持着“仁义”二字。康梅文是在以船队运货,以河运经商,但与此同时也是在以他的方式传递“仁”的理念,输送“义”的精神。而这种商业经营背后的文化经纪,才是康家从无到有、由穷变富的制胜法宝。

其二,在与各种势力的不断较量中匡扶社会正义。康家在发展与崛起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使他们发家致富的道路并不顺遂。但正是通过这种对抗与较量,康家显示出了中原豫商恪守的传统道德与儒家文化的正向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声张人间正气,匡扶社会正义的积极作用。

对康家构成威胁与障碍的势力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这里有以断指乔为首的花家寨劫掠官道商旅的杆子(土匪),有以捉拿“前明余党”为名肆意抓捕嫌疑人士的官衙捕快,还有以“剿匪”为名驻扎下来“设卡抽厘”的官家军队,更有紧盯着康家寻隙除祸的河务侍郎宋海平等贪官污吏。这些不同方面的势力交织一起,不仅对康家正常经商构成极大的威胁,而且还以沉渣一气的为非作歹和狼贪鼠窃,给河洛一代的社会氛围造成了挥之不去的沉重阴霾。以康



梅文、周亭兰为核心的康氏家族,除以舍弃钱财财息灾祸,求访官员疏通关系来渡过难关外,还以救护人犯、帮衬义士、团结民众、揭露贪官等方式扶正祛邪,软硬并举地与邪恶势力展开有力抗争,并以暗中处死宋海平为标志,消除大患、为民除害,取得了斗争的阶段性胜利。

从向后人教授传统文化之精义到维护一方社会之正义,康氏家族的种种作为都有一个内在的精神系连,那就是崇德向善、敬恭桑梓、守正不阿、恤民效国的家国情怀。康氏家族的“字墨”之风,康秀才的文化传授,康家后人的文化认同,其实都是根植于士大夫的文化信仰和中国先哲的人文精神,其核心要素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康氏的经商理财与为人处事都秉持着这样一种理念,贯注了这样一种精神。或者说,豫商康家所以讲究“字墨”,崇尚儒家,正是在以他们的方式体现着建立在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基础上的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这是康氏家族走向致富的最大秘诀所在,也是中原文化的根本内核所在。康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字里行间都蕴藏着也解说着国人特有的家国情怀,这正是这部作品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创作谈

记得童年里,姥姥每晚临睡前都会给我讲一些“瞎话儿”。她讲的“瞎话儿”大多来自于民间的神神鬼鬼的故事,且多是很吓人的。曾记得,在各式各样的“瞎话儿”里,姥姥也曾给我讲过民间的三大财神:沈万三、康百万、阮子兰。好像其中说到沈万三时,她说,沈万三虽家产万贯,楼瓦雪片,有花不完的钱,却“懒”死了。

稍大一些我才知道,这些“瞎话儿”也不过是一些哄孩子的民间神话故事而已。当然,再后来,我明白,那个叫沈万三的“财神”,也并非“懒”死了。

可是,多年之后,当我来到巩义,看到那座城堡似的“康百万庄园”时,童年的记忆一下子点醒了我。河南还真有这样这样一个财神“康百万”呢!就此,我发现,大地是有神性的,人类的所有神话都是有根的。那是历史在时间或记忆中产生变异(或飞跃)的结果。在时间中,它由生活演化成传说,传说演化成故事,故事演化成寓言,寓言演化成神话……于是,这也就成了我对“康百万”感兴趣的最初动机。

创作《河洛图》这部长篇,我前前后后大约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最初,我想当然地以为,在中原大地上,一般是不可能出现所谓“财神”的。历史上,这里战乱频繁,加上黄河连年泛滥,民不聊生。可以说,中原是灾难深重的一块土地,同时也是儒家文化浸润最深的土地,是块“绵羊地”。原本,我以为在这块土地上,除了“忍”和“韧”,再也没有什么了。特别是在过去的一些时间里,我所看到的、听到的、国内有些名号和影响的商帮,有晋商、徽商、浙商、闽商等等,却很少听说过豫商。可让我惊讶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康百万”就在眼前,他竟然还是民间口口相传的“活财神”。那么,在中原大地上,一个家族连续富了十几代、且留下了一座城堡式的庄园,这个家族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这的确靠靠山河洛交汇之地、且诞生过大诗人杜甫的地域,它的神性何在?这正是我想要探究的,也是我创作《河洛图》的第二个原因。

为此,我曾经东到山东临沂,西到山西太原、陕西泾阳去寻找一个地域、一个家族的秘密……我发现,在这里,黄河里的鱼与洛河里的鱼是不一样的。黄河水浊,浪急,那鱼终日在浊浪里翻滚,在漩涡里淘生。每到汛期,浊浪排天,水声如虎。况黄河几乎年年改道,朝不保夕,那鱼每每要经历几场生死搏杀才得以活命。况且,鱼儿每年都要逆流而上,以命相抵,去跃那龙门!所以,黄河里的鱼头大脊黑,大多性烈。一条条亮着黛黑色的脊,跳荡腾挪中鱼尾甩着一片亮红,两腮如金,狡黠的鱼眼尤如黑夜里的一两束红箭。而洛河水清,性也温和。一荡好水从陕西洛南一路走来,两岸土质偏硬,泥沙较少,却从未改道。所以,洛河里的鱼头小脊薄,鱼色偏淡,肚脐处白嫩如雪,两只鱼眼在清水里亮着一片羞羞,显得温文尔雅。水润鱼性,鱼就柔和,顺带三分的灵气和傻气。

我发现,当年的秦人和豫人也是有差别的。两地一为中,一为西,原本都曾为首善之区、繁华之地,又同在朝代更替时,遭刀兵多次戕伐,坡上的草早已被鲜血染透,骨头也曾被砍断过多次。所以,两地人也都是以气为豪,那咽喉处自然就是命门了。不同的是,秦人终究是要喊出来的。秦人走出家门,八百里秦川,一荡荡莽莽梁梁,起起伏伏,塬与塬之间,看似不远,却又隔着深沟大壑,人心也就有了起伏,当硬则硬,当软则软,越是人烟稀少处,越要野地吼上两嗓子,那是给自己壮胆。于是这里就成了四处歌地,一代一代人传下去,则为秦腔。而豫人呢,大多居一马平川,鸡犬相闻,人烟稠密。人多言杂,言多有失,则只好咽下去。那吼声在九曲回肠里闷着,一个个修成了金钢不坏的躯壳,内里却是柔软的。分明在等着一个牵“象”的人,而后就厮跟着走。因那吼久闷在心里,喊出来就炸了。一代代传下去,是为豫剧。

比如,我发现,你无论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有“山陕会馆”。那是晋商的群体历史,是一个商帮的历史。自然不是“神”。而“康百万”为什么就成了民间的“神”呢?在空空荡荡的庄园里,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刻在匾上的一句话:“以不尽之巧还造化”。这句话对于人类的现实和未来,都是具有警示意义的。什么是“造化”?那是天空、大地、阳光、绿水、青山、万物、生灵……人们哪,千万不要把你们的聪明才智用尽。切记,切记。

在中原,“康百万”只是一个个案。我想研究这个个案。但解读一个民间“财神”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我直观看到的只是一个二百年前的“城堡”,空空荡荡的城堡和一些零零散散的传说。坦白说,我不知道那一块块古老的砖石会告诉我什么,当然,对300年来被民间称之为“活财神”的家族有很多的解读方式,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是文学化了的解读方式。就此说,《河洛图》是一部我加入了个人的认知、超越了具象现实的再创作。

我一直把“平原”当作我的写作领地。当然,这个“平原”已不是具象的某个地方,而是我心中的“平原”。它是深受儒家文化浸润的一块土地,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与我有很深的感情。我说过,我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生命状态,着重写一个特定地域的精神生态,研究的是一个特定地域的“生存法则”。《河洛图》所阐释的最重要的主题是:时间。在大时间的概念里,可以说,任何聪明和算计都是不起作用的。

由此,《河洛图》的创作当是我追寻平原“神性”思维的一个过程。

追寻平原的「神性」

□李佩甫

■短 评

爱的呈现与繁衍

——读李定新诗集《风吹过梅山》 □易清华

读李定新最近付梓问世的诗集《风吹过梅山》,让我有一种深切的感受,我将这种感受归纳在一个“爱”字上。对于“爱”字的使用,每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维度,取决于人们对他所处时代的感知,就像鱼与水的关系。爱,这个字,我敢肯定,它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后,是人类在最关键的时刻所发明、所创造的,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且维持着整个人类体系。它没有一刻会消亡,虽然有时会被隐藏,甚至被遮蔽,但最终会显示出爱的力量。

《风吹过梅山》这本诗集中有着多层次的爱的精彩呈现。诗人在《接父亲回家》中写道:“一大早,母亲便将床沿的烟斗/移到了火塘桌角,用第一缕晨光/擦亮了又擦/采回一把新茶,再到屋后土园/摘来一些时令小菜。”在这首诗中,一开始是日常的生活,一个农村家庭主妇的工作,生火塘、擦烟斗、采茶叶、摘小菜,这些生存层面的本能性劳动,普通而又平凡。在这里的爱表面上被隐藏,实际却沉藏在每一个字词和标点里。诗人在关键的时刻动用象征与想象的力量,这种力量体现在父亲的那只烟斗上,母亲擦了又擦,用的是“第一缕晨光”。这第一缕晨光,就是爱最初的动作。

在这首诗进行到中途时,平衡感开始打破,出现了一个转折,“母亲执拗地拒绝了我们的参与/自己倚着腰刀扫堂屋、阶基、禾场/地肉、切菜、戳冥钱”。这时的母亲开始显示出自己的个性,她是执拗的,因为这时的爱对她来说是自私的,她要一个人去完成,不能同任何人分享。而母亲所做的一切是为了迎接去世的父亲:等着父亲,以一只蝙蝠或蚂蚁的形式回家。在此,父亲化作了一只黄昏天空中飞翔的蝙蝠,或者是地上一只不易察觉的蚂蚁,这正是爱,赋予了生命卑微、普遍同时又是令人心动的形式。

李定新将他这本诗集取名为《风吹过梅山》,是因为他对湘中这片生养他的古老而神秘的土地有着一种虔诚的热爱。他在出版第一本诗集《灵魂的村庄》时就说过,他今后创作的视野,要从胞衣地冲延伸开脚下的整个梅山。《风吹过梅山》的问世,算是他实现了自己当初的承诺。梅山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而不是某一座山峰的名字,安化是古老梅山的核心地域。以前的老县城就叫梅城,这个古镇的名字至今都没有改变。这个地域“旧不与中国通”,不服朝庭管辖,直至康熙五年建县才归安德化。千百年

来,梅山先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繁衍生息,他们留下的神秘而珍贵的文化遗存让外界叹为观止。李定新说,每到夜深人静时,他总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情愫,在电脑前,像一位雕刻师面对一块罕见的玉坯,先是韵神造型,然后开始小心翼翼地敲敲打打。在《梅城》这首诗中,他如此写道:“梅山的心脏/跳动是否正常/一个王朝/伸出一只长达三十六铺的手/小心地探着脉搏/朝代更替 风云散尽/近千年后/我在一截破裂的血管里/摸到那块趴在壁上的青砖/温热尚存/依稀仍有刀枪刺出的血渍/在汨汨流淌。”地域性诗歌写作具有高难度,其历史人文知识要求之高、立意出新之难、技巧把握之准,无异于刀刃上炫舞,稍有不慎就容易落入俗套。而李定新的这首短诗简洁、精准、有力,既有丰富的文化元素,又有生动的形象。诗人用“破裂的血管”“趴在壁上的青砖”来指代文化遗迹,又以“温热尚存”“依稀仍有”“汨汨流淌”等词语,昭示着一种历史的延续性,颇有余味。

据我所知,写梅山文化的诗人并不多,李定新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地域性写作自觉的诗人。在《风吹过梅山》这本诗集中,李定新将其出生的山村乐冲,作为他抒发故乡情怀的一块重要挖掘地,此地同时也是梅山文化的要塞,李定新浸淫其中,既是梅山文化的禀承者、传递者,同时又是爱的使者,他的诗基于爱的理由,基于生命的快乐,充满了感人的细节、深层的情感、万物的奥妙。

ART PANORAMA 双月刊 2020年第二期(总207期)要目 主编:张立军 邮发代号:8-45

征集书稿启事 海心同行 辉煌共进 图书选题策划 设计制作 代理出版 推介发行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2020年第2期(总第8期) 主编:吴义勤 白烨